



越文化研究丛书

范文澜传

谢一彪 著

下卷





越文化研究丛书

范文澜传

谢一彪著

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文澜传 / 谢一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1

ISBN 978 - 7 - 5161 - 7079 - 3

I. ①范… II. ①谢… III. ①范文澜(1893 ~ 1969) - 传记

IV. ①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59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刘京臣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50.5
插 页 2
字 数 813 千字
定 价 148.00 元 (全二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下 卷

第十五章	开拓创新	(465)
第一节	创建中国史学会	(465)
第二节	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470)
第三节	繁荣学术研究	(476)
第四节	标点《资治通鉴》	(484)
第五节	点校二十四史	(489)
第六节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498)
第七节	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502)
第十六章	思想改造	(508)
第一节	坚辞未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508)
第二节	批判电影《武训传》	(512)
第三节	“新我”战胜“旧我”	(517)
第四节	和风细雨进行思想改造	(523)
第五节	清算唯心主义	(528)
第十七章	创建新所	(534)
第一节	成立近代史研究所	(534)
第二节	组建近代史研究团队	(541)
第三节	培养近代史研究后备力量	(549)
第四节	征集近代史资料	(554)
第五节	编纂近代史资料	(566)
第十八章	同心协力	(573)
第一节	倡导集体研究	(573)



第二节	修订《中国近代史》	(579)
第三节	编纂“大书”《中国近代通史》	(583)
第四节	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	(586)
第五节	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596)
第十九章	重写通史	(602)
第一节	精益求精	(602)
第二节	重起炉灶	(607)
第三节	雅俗共赏	(613)
第四节	论学四则	(618)
第五节	秉笔直书	(624)
第六节	日暮兼程	(630)
第二十章	大鸣大放	(638)
第一节	倡导百家争鸣	(638)
第二节	批判三大“右派”	(646)
第三节	谴责“四大金刚”	(652)
第四节	驳斥“荒谬建议”	(659)
第五节	沉冤大白	(666)
第六节	尚钺落难	(672)
第七节	与元维“划清界限”	(678)
第二十一章	山雨欲来	(687)
第一节	倡导“厚今薄古”	(687)
第二节	破除知识“迷信”	(692)
第三节	主持制订“跃进”计划	(697)
第四节	“改上续下”无疾而终	(703)
第五节	忧心如焚	(709)
第二十二章	侥幸逃脱	(718)
第一节	开展“四清”运动	(718)
第二节	被控“保皇党头目”	(723)
第三节	戴上“东霸天”、“西霸天”的帽子	(734)
第四节	敲山震虎	(741)
第五节	元缓在劫难逃	(746)



第二十三章 风范永存	(755)
第一节 不知老之将至	(755)
第二节 新史学宗师	(764)
第三节 时代造就的历史学家	(772)
第四节 等富贵如浮云	(777)
第五节 永恒的丰碑	(783)
参考文献	(786)
后记	(792)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
越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学勤 陈伯海 高丙中
董乃斌 葛剑雄 黄霖

主 编 寿永明

执行主编 潘承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华 叶 岗 冯根尧 寿永明 李生校
张炎兴 周鸿勇 费君清 高利华 钱 明
梁 涌 陶 侃 章 融 谢一彪 潘承玉

下 卷

第十五章

开 拓 创 新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筹建新史学研究会，团结历史学家，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成立中国史学会，组织史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被誉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举行纪念性的学术活动，倡导严肃学风。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委托，组织专家点校《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主持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创建中国史学会

北平解放后，中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新中国正在筹备之中。为了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迅速打开新局面，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础，中共中央在军事政治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学术文化领域的组织工作也相当重视，并得到学术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25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指定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在勤政殿举行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座谈会，分工筹备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五方面的组织，定期召开发起人大会。经周恩来拟定名单，史学方面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郑振铎、吕振羽、吴玉章、吴晗、傅彬然、杨绍萱、叶蠖生等13人。7月1日，吴玉章、范文澜等50人发起，要求成立中国新史学会，并正式成立筹备会。下午3时，发起人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与会者有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等30余人，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以及向达、陈中凡等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全国史学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



的建设工作。会议通过筹备会的组织规程和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并决定迅速筹备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选举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选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邓初民、陈垣、侯外庐、翦伯赞、向达、吴晗、杨绍萱、吕振羽 11 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筹备会常委会推选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侯外庐、杨绍萱为秘书，负责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规定该会的宗旨、会员和组织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其宗旨为“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①。会员须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赞成本会宗旨，并愿遵守本会会章。该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大会选举理事若干人组织理事会，为大会闭幕后的执行机关。理事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由全体理事互选。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理事会认为必要时，设立各种委员会，从事调查、发掘、研究、编辑等工作；可举办各种学习小组，兴办讲习会。省或中小城市成立分会，须经理事会批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史学工作者组成，第一种是受过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历史教育，从旧社会过渡来的成名史学家或著名的历史工作者；第二种是在白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或前进的史学家；第三种是从延安（解放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虽然参加筹备会发起人会议的旧史学出身者相对较多，但在常委会成员中，来自解放区和白区地下工作者则占多数。

随后，相继筹建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和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各学会推举范文澜等十名代表，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名义，作为一个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的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开展活动，并组成联合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办事机构的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简称“社联”，地址设于北京南河沿金钩胡同甲 19 号一个小四合院。门前还有一个标志，以中国地图的轮廓作为底图，上

^①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2 日。



画五面小旗，代表五个研究会。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各派一名秘书和一二名干事，在“社联”办公。各研究会筹备会的负责人分别为新哲学会李达、新政治学会王昆仑、新法学会张志让、新经济学会狄超白、新史学会范文澜。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简称“中国新史学”。“新史学”，顾名思义，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研究。范文澜领导新史学研究会开展一系列工作。1949年12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召开筹备会，周谷城、李亚农、金兆梓、周予同、李平心、顾颉刚等人参加。1950年3月，上海分会设立机构和职员。按照总会规定，南京、杭州也归入上海分会活动。此后两年间，中国新史学会总会会员达289人，河南、广东等15个省市也设立分会或筹备会，全国各地会员达606人。北京的中国史学会的活动较为活跃，召开多次会议，传达和宣传新史学会精神。

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经常组织不定期的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探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座谈会并非教条主义的学习，而是根据各人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研究历史的经验，从实际出发，自由发挥，相互切磋。北京地区的有关研究所和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可以自由参加。开会地点就在“社联”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座谈会只谈半天，也不备午饭，会后各自散去。“中国新史学筹备会的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由范老主持。范老为人平易近人，他主持的座谈会也是十分融洽和谐，生动活泼。这些活动，使得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家、史学家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学教授、专家们很快地彼此熟悉起来。通过自由讨论，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建立起友谊。”蔡美彪回忆一次生动的座谈会：“我那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有时也来听会。记得有一次，徐特立徐老来参加会，讲自己研究历史的体会。徐老那时已年过七旬，侃侃而谈，兴致甚浓。范老主持会议，说：‘徐老，时间不早了，大家要回去吃饭了。’徐老说：不，我还要再说几句。徐老是人们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是毛主席的老师。他和史学界的人士一起开会，谈笑风生，十分亲切。”^① 范文澜领导中国新史学筹备会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团结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展历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蔡美彪：《中国史学会的建立》，《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3页。



1951年7月28日上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工作，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140余人，大都是北京地区的史学工作者。范文澜致了简单的开幕词：“今天的会是我们史学会很盛大的一个集会，照原来的估计，现在正值各学校暑期休假，好多同仁不在北京；又值各机关正在热烈展开政治自觉的学习运动，好多同仁工作特别忙。因此我们预计今天到会的人数是不会很多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估计错了。这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史学会是很关心的，对于史学会的成立是很注意的。”^① 范文澜请郭沫若和吴玉章发表讲话，以指明史学工作者研究的方向。



1951年中国新史学会成立大会留影

郭沫若作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报告，首先肯定范文澜领导的中国新史学会取得的成绩，“在这两年零一个月的过程当中，承范老和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史学会筹备会是做了许多工作，有了一些成就。在组织方面来讲，总会会员已有289人；各地分会和分会筹备会已有15个，全国各地会员已有606人，加上总会会员，全国总共已有会员900余人。在工作上讲，经过两年多来的努力，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②。郭沫若从六个方面分析中国新史学会取得的收获，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研究

^① 范文澜：《中国史学会成立开会词》，《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②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近代史，由大汉族主义转向尊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这是两年来新史学研究取得的成果。

范文澜以“史学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为题，总结中国新史学会已有的六点成绩。“一、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们每个同仁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二、我们的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了。现在我们努力想定出比较一致的教学提纲，虽然还没有完成初步的定稿，但这样做下去，初步的定稿是可以产生的。三、我们史学会在搜集史料方面做得很不差。这个工作对研究近代史是很有贡献的。四、亚洲小组同仁们要编辑亚洲史目录，这个工作规模颇大而且是草创，参加这个工作的同仁都很热心。郭老看到这个计划很赞成，已经批准。等到批下来以后，就可以很快地做起来。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首先是要把自己所有史料公布出来，个别少数知识分子不肯公布史料的作风是应该批评的。希望有好材料的同仁要把它公布出来，让大家共同研究。五、我们会里有一个小组，专门组织那些亲身经历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历史事件的先生们，给我们讲述亲身参加和亲眼看到的事实。从这些讲述里，可以得到许多不见于书本上的可贵史料。六、专题报告会，我们也举行了若干次，对某一问题研究的心得，在这种会上提出来很有好处。此外，史学会同仁们正在计划编辑国内少数民族史史料，亚洲各国史小丛书。”^① 史学会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郭沫若的指示。

大会讨论了学会的工作和旨趣，宣告筹备会已完成任务，正式成立学会。根据林伯渠的意见，取消了“新”和“研究”，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学会”。中国史学会选出第一届理事会，由理事、候补理事 52 人组成。9月 17 日上午，在“社联”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由吴玉章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范文澜等 20 位理事。会议推举郭沫若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向达任秘书长，郑振铎为副秘书长。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为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成立后，郭沫若和吴玉章因工作较忙，日常会务仍委托范文澜主持。1952 年，“社联”撤销，史学会秘书刘寿林、干事王

^① 范文澜：《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



世昌均调到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图书资料室工作。刘寿林仍兼任中国史学会的秘书工作。

第二节 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史学工作者应充分占有史料，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寻求历史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仅限于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且指导思想仍是唯心主义。根据地的学者也整理出版过中国近代史料，但受到条件限制，大规模的整理难于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系统整理中国近代史料成为可能。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为前提。中国新史学会筹备期间，主持工作的范文澜就开始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0 年成立总编辑委员会，有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为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主，集结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组成总编辑委员，成为最高规格的历史资料编辑指导机构。

1950 年是义和团运动五十周年，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因此，“清算帝国主义罪行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办法”。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的《义和团》资料，成了丛刊的第一部资料，先行编辑出版。编辑工作由翦伯赞任主编，荣孟源等人参加。1950 年底即已编辑付印。1951 年 2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近期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报道，其编辑方针为：一、编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完结为止；二、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和论断；三、所录资料必须能反映近代史的某一运动的主要内容或某一侧面；四、所录资料，一律保存原型。其中由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已经排版，拟 1951 年 3 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公开出版，分编四册，约 150 万字。初版原题署“中国新史学会主编”。中国史学会成立后，该书重印才改署“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史学会成立后，从 1951 年至 1958 年，其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当然不是范老一个人的主张，但范老是最重要的倡导者。在总编辑中范老名次在



徐特立之下，他是实际的总负责人。”^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原计划12个专题，分头编辑，陆续出版。1951年出版《义和团》后，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和《捻军》，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齐思和主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20世纪60年代就已编成，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出版，延及1979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会确定的《北洋军阀》专题未及编成，直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由原来承担编辑工作的南开大学来新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完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会的原定计划，得以全部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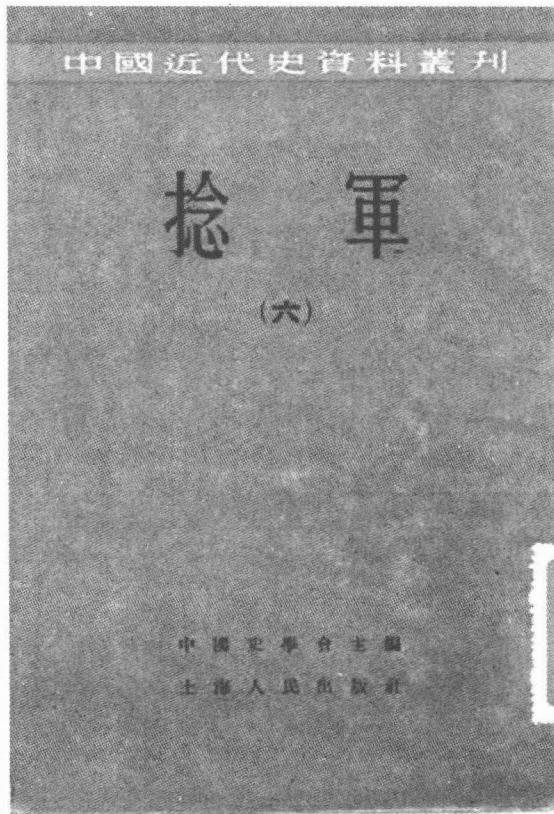
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各种资料，多者8册，200多字，少者4册，也有100多字，全套丛书共68册，合计字数2758余万字，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学者编辑的规模最大的一部资料书。“在范老主持史学会工作期间，从1950年首创编辑《义和团》资料到1958年《洋务运动完成》，次年出版。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丛刊》10种，60册，而且是连年出书，持续不断。这样的工作效率，现在看来，也还是很高的。”^②每一个专题都由几个人组成一个编辑小组，一般五六人或七八人，由其中一人担任主编，范文澜担任《捻军》主编。各个专题编辑的学者，几乎汇聚当时主要的历史研究者。许多专题资料编辑的主持者，如翦伯赞、向达、白寿彝、齐思和、聂崇岐等人，虽然对近代史有相当的研究，但并不是以近代史作为自己的主攻专业。至于参加编辑的人员，更包括范围广泛的各方面专家。他们响应中国史学会和范文澜的号召，参加近代史料的编辑工作，并非为了个人著书立说，而是自觉地为开展近代史的研究服务，为史学工作者服务。各专题在搜集资料和征集优良版本的过程中，得到学术界、社会贤达和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纷纷捐献私人收藏史料，贡献大量珍本、钞本、善本。贡献珍藏史料的学者和社会贤达，其中《鸦片战争》专题有郑振

^① 张寄谦：《范文澜和北大历史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蔡美彪：《中国史学会的建立》，《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6页。



锋、向达、王重民、张元济、祁龙威、林纪寿、徐宗元等人；《戊戌变法》专题有张元济、叶恭绰、康同璧、梁启勋、梁思庄、张次溪等人；《辛亥革命》专题有钱基博、章士钊、叶恭绰、李根源、周素源、秦翰才、张静庐、陆丹林等人。范文澜主持下的中国史学会，倡导艰苦朴素的作风，“史学会组织《近代史资料丛刊》那样大规模的工作，从来没有租宾馆开大会，而是大家埋头苦干，切实地又是高效率地完成了计划”^①。正是大家相互支持，通力合作，才能在不长的时间，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原由上海一家私营企业神州国光社出版，公私合营后改为新知识出版社，后来合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仍继续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捻军》

^① 蔡美彪：《中国史学会的建立》，《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8页。